

经济发展、地区分工与地方贸易保护

王小龙 李斌*

摘要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从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角度对地方贸易保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对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及其与地区分工相互关系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来研究地方贸易保护行为。文章认为,中央政府打破和消除地方贸易保护目标的实现应当围绕引导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决策从短期向长期转变为中心而采取相应措施。

关键词 经济发展, 地方贸易保护, 新兴古典经济学

一、引言

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方面表现为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即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在对发展的理论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只关注组织或制度既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显得乏力。随着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理论开始被重新思考,复兴古典经济发展理论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核心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是这一学派研究的中心。从古典学派的角度看,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专业化和分工发展的过程。在产权界定基础上的专业化生产与人们消费上的多样化偏好产生了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人们通过交易享受到了专业化和分工带来的好处。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专业化程度越深,专业化种类越多,分工结构越发达,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量就会越大,市场也就越发达。从分工的角度看,经济发展要求市场分工不断细化,市场的交易规模不断拓展,最终形成统一的大市场。著名的斯密定理揭示了统一大市场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斯密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杨格(Young, 192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不仅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也取决于分工的程度,可见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分工的发展相互决定,互为因果。但是容易看到,上述经

* 王小龙,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李斌, 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 李斌,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710069; 电话: (029)8307287; Email: libin1998@263.net。作者感谢杨小凯教授、何炼成教授、贾明德教授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工作的鼓励与支持, 感谢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与会者的评论, 同时感谢西北大学孙天琦和姜文以及北京大学蔡荣和邹燕的热情帮助与评论。一位匿名审稿人对文章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当然, 文责自负。

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在我国现实经济运行中并不顺利,突出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普遍存在着地方贸易保护行为,而且近年来地方贸易保护在某些地区和领域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保护的方式与手段也日趋多样化。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形成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驱动与地方保护力量的抗衡成为发展过程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类经济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大背景下,¹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地方贸易保护问题,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对内开放,应具有更加重要和特殊的意义。然而,以往对这类现象的研究基本停留在一般性的现状、成因分析和相应的对策建议上,也缺少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我们认为,缺乏从分工演进与经济发展大背景出发进行的系统分析是这一问题研究上的一个明显缺憾。本文试图运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New Classical Economics)及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从分工演进与经济发展角度对地方贸易保护行为与政府角色定位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将回答几个相关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及其与地区分工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长期和普遍地存在着地方贸易保护行为,其形成机制是什么?为什么地方贸易保护基本发生在发达地区(行业)与欠发达地区(行业)的贸易中而不是发达地区(行业)之间?对于地方保护行为,中央政府应当发挥怎样的职能,如何实现正确的角色定位。

二、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

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需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古典经济学和现代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研究成果及各学派之间的交叉互补深刻地揭示了专业化、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和一般机制。在萨克斯和杨小凯(Sachs and Yang, 2001)看来,经济发展或者说贸易产生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driving force)主要有两种:一是不同经济主体间的外生比较优势;二是内生绝对优势。²这正是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斯密认为,天生相同的人可以通过后天选择不同的专业而产生不同产品生产率的差异,贸易产生的根源即在于这种不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这种“绝对优势”并不是产生贸易好处所必要的,他强调了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在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兴起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绝对优势是比较优势的一个特例,因此更关注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开始引起人们的重新思考。一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之间以及相同或相近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量要远大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即“林达尔”(Linda)贸易模式,这一现象对李嘉图理论提出了挑

¹ 在WTO规则中,保证统一实施的责任在法律上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如果地方保护使来自成员国的产品、服务受到了歧视性待遇,中央政府会面临来自其他WTO成员国提出争端仲裁的麻烦。

² P. 鲍尔(Bauer, 1992)就认为,忽视贸易活动是传统主流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缺点之一,如果贸易活动及其影响被正确理解,那么主流发展经济学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他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R-N学派也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战;二是在李嘉图贸易理论中,人们只能利用外生给定的比较优势,这一优势本身不能被内生地决定和发展演进,而且李嘉图模型中只有一种投入要素,其边际的和平均的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不存在报酬递增,这使其难以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三是李嘉图理论虽然被当作贸易理论的基石,但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关注,突出表现在比较优势理论很少被纳入到正式的数学模型中去,因为李嘉图理论在模型化中会涉及角点解,³而传统的边际分析不能用于这类模型(杨小凯等,1999)。

针对李嘉图模型上述缺陷的理论思考推动了现代经济学在不同层面和方向上的发展。在强调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古典经济学之后,马歇尔将“规模经济”概念引入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当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而提高时,就称存在着内部规模经济,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一个企业的生产力随着整体经济或一个部门规模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是由单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扩大而产生的。作为无法对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进行形式化处理的一个替代物,⁴马歇尔建议使用外部规模经济这一新的概念。事实上,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现象很接近于当代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所产生的网络效应。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当作经济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量,经济学家利用规模经济尤其是内部规模经济来解释经济增长与发展。在迪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模型中,有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一方面规模经济要求生产产品的种类越少,每种产品的产量越大越好,另一方面消费的多样化偏好又要求较多的产品种类数。市场会折衷这一两难冲突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内生地决定市场上的产品种类数。容易看到,经济规模、市场容量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都会有利于折衷上述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前提是要要求统一大市场的形成。D-S模型的独特方法和有趣结果推动了当代贸易和增长理论的发展。例如在D-S模型中,交易双方并没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却产生了后天的绝对优势。而克鲁格曼(Krugman, 1979)正是利用这一方法,用规模经济解释了国际贸易为何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比较优势较多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所谓“林达尔”贸易模式。人们发现,利用规模经济概念可以将规模报酬递增引入模型,改变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单一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总体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定,从而能够解释一些新的发展现象并将某些重要的经济增长变量内生。埃蒂尔(Ethier, 1979)就利用规模经济与机器种类多样化的两难冲突将机器种类数、贸易依存度等变量内生。机器种类的增加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受到这一点的启发,卢卡斯(Lucas)和罗默(Romer)将外生规模经济引入模型而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没有外生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知识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杨小凯, 1997)。

³ 在李嘉图模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首先需要决策的是与外部贸易还是不贸易的问题,即是或否的问题,因此会涉及到对角点解的处理,而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处理的是内点解。

⁴ 杨小凯指出,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分工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会涉及到角点解,而处理角点解问题的数学方法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

与运用规模经济概念的方法不同,以杨格、贝克尔(Becker)、杨小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研究报酬递增和内生经济增长,因为按斯密的理论,劳动分工提高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提高生产率这一原理的。可见,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讲,一个十分基本和必须回答的问题是:递增报酬实现的源泉是什么?是规模经济还是专业化与分工?把生产函数从新古典的不变规模报酬假定修改为报酬递增时有两种途径:一是从规模经济角度;二是从专业化和分工角度。到底哪一种更为科学和根本,两者的关系如何?

杨格(1928)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即“分工和专业化是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不仅市场大小决定分工,而且分工也决定市场的大小”,“供给和需求是一个铜板的两个反面”。杨格定理的突出特点是注重从经济网络和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待问题。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应当从累进的分工和专业化角度来看,将产业的运作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递增报酬来源于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递增报酬是专业化分工的经济网络的基本特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规模经济只有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不进行专业分工,而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扩大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进一步地看,专业化生产意味着生产者对供给其生产的产品而对其他产品的产生需求,从而产生交易,需求和供给都源于专业化分工。分工的发展会带来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会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经济中的递增报酬正是源于分工水平提高与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或者说分工的网络效应。专业化分工才是递增报酬与经济增长的根源。⁵

与分工和专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交易起着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联系纽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但是交易行为本身是需要费用的,是有成本的。这样,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带来经济主体之间更多的交易行为,进一步拓展经济网络;另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会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过高的交易费用会阻碍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减少人们之间的交易行为。而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促进人们之间通过交易获得来自专业化和分工的好处,加速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行为构成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基本概貌,而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之间此消彼长的两难冲突(trade off)及其有效折衷则成为贯穿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条主线。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的新兴古典框架正体现了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融合,可能更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同时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贸易保护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更有解释力。

当我们审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应当从上述发展的一般机制出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现象,而是由其所处的经济网络的分

⁵ 关于这一问题的更详细的理论论述和经验研究可参见张永生(2000)。

工水平所决定的, 一个地区分工的形成及其演进就是其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网络的过程, 而网络的规模是同市场规模同步发展的, 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

三、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 一个分析框架

上文已经谈到, 现代经济学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模型化研究涉及到角点解, 而这是以边际分析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难以解决的。幸运的是,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成功地解决了对角点解的处理问题, 使我们能够抛开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的分析框架, 而将经济主体看作一个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 来研究其可能做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显然, 这样的假设更符合现实, 从而大大增强了超边际分析对地区间贸易行为的解释能力。程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 (Cheng, Sachs and Yang, 2000)、萨克斯和杨小凯 (2001) 以及张定胜 (1999) 对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为研究我国的地方贸易保护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就利用一个简单的引入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地区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方贸易保护问题。⁶

为了简化, 从我国经济中选取两个地区进行研究。假设: (1) 整个经济系统就由这两个地区构成, 两地区都只需要消费两种商品 x 和 y ; (2) 地区 2 相对地区 1 具有生产 x 和 y 两种商品的绝对优势, 而地区 2 生产 y 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同生产 x 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之比要大于地区 1, 这意味着地区 1 具有生产 x 商品的比较优势, 地区 2 具有生产商品 y 的比较优势; (3) 假设两个地区都由大量相同的基本经济单元组成, 将每一个经济单元抽象为一个个体, 每个经济单元都是一个独立的生产—消费主体。这意味着每一经济单元为实现消费 x 、 y 两种商品的目的既可以选择自己两种产品都生产的自给自足模式, 也可以选择专业化生产其中的一种, 然后出售这类商品以换取另一种商品, 同时还可以选择两种商品都生产但也进行部分交换的半分工状态。

可以发现, 上述多种分工状态在我国社会经济中都分别存在, 发达地区相对来讲专业化水平更高, 专业化生产种类数更多, 而欠发达地区则更接近自给自足经济, 通常以半分工状态存在。

不妨设地区 $i(i=1,2)$ 中的每一个基本经济单元的效用函数是:

$$U_i = (x_i + kx_i^d)(y + ky_i^d), \quad (1)$$

⁶ 对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之所以重要, 还在于李嘉图模型描述的是两国在各自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产品基础上的贸易行为, 而生产的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正是一个完整的分工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因此对带有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非常有利于说明分工经济的产生、发展与演进, 来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

这里 x_i, y_i 为商品 x 和 y 自己生产并且供自己消费的数量, x_i^d, y_i^d 为从市场上的购买量, k 是交易效率系数, 且 $0 \leq k \leq 1$, 因此 $1-k$ 即为交易费用。相应的约束条件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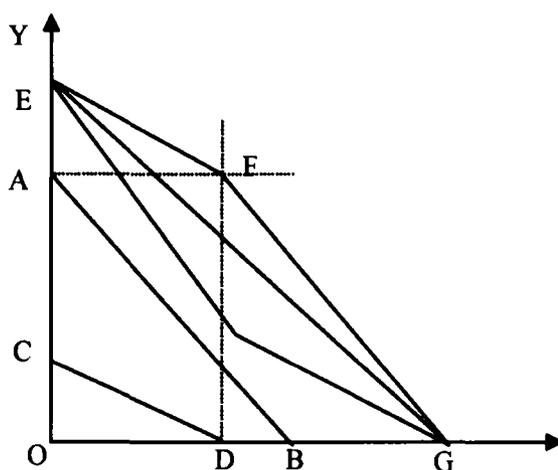
$$\begin{aligned} x_i^p &= x_i + x_i^s = \alpha_{ix} l_{ix}, & \text{生产函数} \\ y_i^p &= y_i + y_i^s = \alpha_{iy} l_{iy}, \end{aligned} \quad (2)$$

$$l_{ix} + l_{iy} = 1. \quad \text{劳动量约束} \quad (3)$$

这里, x_i^p 和 y_i^p 分别代表地区 i 中的一个经济单元 x 和 y 商品的产量, x_i^s 和 y_i^s 为 x 和 y 商品的售卖量, l_{ij} 代表地区 i 中的一个经济单元用于生产商品 j (j 为 x 或 y) 的劳动投入量, 它代表了生产这种商品的专业化程度, 而总劳动量为 1, α_{ij} 则表示生产商品 j 的劳动生产率。地区 1 具有生产 x 商品的比较优势, 因此有:

$$\frac{\alpha_{1x}}{\alpha_{1y}} > \frac{\alpha_{2x}}{\alpha_{2y}}.$$

为了更清晰地说明地区分工的好处, 假定 $\alpha_{1x} = 2, \alpha_{1y} = 1, \alpha_{2x} = 3, \alpha_{2y} = 4$ 。将 (2) 式代入 (3) 式, 可得 y 与 x 之间的转换函数斜率为负, 因此有下图:



图中 CD 为地区 1 中一个经济单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AB 是地区 2 中经济单元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EG 是两者总合的转换曲线, F 点是两者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后可以到达的生产力水平, EFG 代表了在实现各自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分工后可以达到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EFG 构成的三角形面积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专业化生产后相对自给自足经济而对整体社会经济带来的新增生产力, 它增大了社会总体福利水平, 杨小凯将此称之为“分工经济”。可见, 当不能或不能充分形成不同地区建立在各

自优势基础上的专业化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由贸易的经济形态时, 整个经济就可能全部或部分丧失分工经济带来的生产力和福利的增进。

下面利用超边际分析求解模型。模型中的6个变量 $x_i, x_i^s, x_i^d, y_i, y_i^s, y_i^d \geq 0$, 这使它们之间在取零与非零值时会构成 $2^6 = 64$ 种组合。由于这些组合之间是非连续的, 因此不可能仅仅利用边际分析就能找到最优决策, 必需首先运用边际分析分别计算每种组合中的效用水平, 再通过比较找到整体最优解。幸运的是, 我们不需要对64种组合都进行求解, 因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符合最优条件或在现实经济意义上不能成立, 可以将它们排除。由于买和卖同种商品会产生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因此, x_i^s 和 x_i^d 不会同时为正, y_i^s 和 y_i^d 不同时为正。这样预算约束要么为 $p_x x_i^s = p_y y_i^d$, 要么是 $p_x x_i^d = p_y y_i^s$, 通过上述两个条件可以排除掉52种组合。效用函数 $(u_i = (x_i + kx_i^d)(y_i + ky_i^d) > 0)$ 意味着多样化消费偏好, 因此不能有 $x_i = x_i^d = 0$ 或 $y_i = y_i^d = 0$ 出现, 据此可以再排除7种组合。每个经济单元都不会去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 这样可再消除2种组合。最终会出现三种可能的分工结构: (1) 自给自足, 这时 $x_i, y_i = 0, x_i^s = x_i^d = y_i^s = y_i^d = 0$, 我们称之为结构A; (2) 部分专业化的分工结构, 即地区i中的一个经济单元处于半分工状态, x, y两种商品都生产, 同时出售其中一种而从市场上部分购买另外一种, 我们将地区1中的经济单元生产x, y两种商品并向专业化生产y的地区2中的经济单元出售部分x购买部分y的经济称为结构Ba, 结构Bb则代表了与此相反的状态; (3) 完全专业化的分工结构, 即各自完全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换, 记为结构C。

在现实经济中, 理性的经济主体会分别计算上述三种分工结构可能具有的效用水平, 并选择其中效用水平最高的分工结构, 这种结构就会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一般均衡结构。以Ba为例。在结构Ba中, 地区1的一个经济单元满足 $x_1, y_1, x_1^s, y_1^d > 0, x_1^d = y_1^s = 0$, 因此有:

$$\begin{aligned} \max U_i &= x_i(y_i + ky_i^d) \\ \text{s.t.} \quad x_i + x_i^s &= 2l_{ix} \quad y_i = l_{iy} \\ y_i^d &= Px_i^s \quad l_{ix} + l_{iy} = 1, \quad \text{其中 } P = \frac{p_x}{p_y} \end{aligned}$$

将约束条件代入效用函数有:

$$U_1 = (2l_{1x} - x_1^s)(1 - l_{1x} + kPx_1^s).$$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地区1中的经济单元半专业化生产x, 因此其劳动投入时间 $l_{1x} < 1$ 。通过计算 $\partial U_1 / \partial x_1^s = 0$, 可以得到当 $p > 1/2k$ 时, $\partial U_1 / \partial x_1^s > 0$, 这意味着生产x的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会带来效用水平的上升, 因此人们会选择专业化生产x。只有当 $p = 1/2k$ 时, 经济主体才会选择x与y都生产的半分工状态。

地区 2 中的经济单元满足 $y_2, y_2^s, x_2^d > 0, x_2, x_2^s, y_2^d = 0$, 因此有:

$$\begin{aligned} \max U_2 &= (kx_2^d)y_2 \\ \text{s.t.} \quad y_2 + y_2^s &= 4 \quad y_2^s = Px_2^d. \end{aligned}$$

在分别计算上述两个最优化问题后, 通过市场出清条件 $M_1x_2^s = M_2x_2^d$ (M_1 和 M_2 分别为地区 1 和 2 中经济单元的数量) 可以分析不同经济单元之间在市场上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 从而解出 Ba 结构的角点均衡。使用同样方法分别计算上述四种结构, 可以得到下列结果。

表 1. 李嘉图模型中的四个角点均衡

结构	相对价格 (P_x/P_y)	参数区间	效用水平	
			地区 1(U_1)	地区 2(U_2)
A			1/2	3
Ba	$\frac{1}{2k}$	$k < k_1 = \frac{1}{4} \cdot \frac{M_1}{M_2}$	1/2	$8k^2$
Bb	$\frac{4k}{3}$	$k < k_1 = \frac{3}{2} \cdot \frac{M_2}{M_1}$	$\frac{4}{3}k^2$	3
C	$\frac{2M_2}{M_1}$		$\frac{1}{2} \cdot \frac{4M_2}{M_1}$	$3 \cdot \frac{2}{3}k \cdot \frac{M_1}{M_2}$

超边际分析方法要求在比较上述四个角点均衡效用水平的基础上, 找出不同参数范围内的最优均衡结构。通过比较有:

表 2. 李嘉图模型的一般均衡及其比较静态

参数区间	$k < k_0$		$k > k_0$		
	$\frac{M_1}{M_2} > 4 \cdot (\frac{3}{8})^{0.5}$		$\frac{M_1}{M_2} < 4 \cdot (\frac{3}{8})^{0.5}$		
	$k \in (k_0, k_1)$	$k \in (k_1, 1)$	$k \in (k_0, k_2)$	$k \in (k_2, 1)$	
最优结构	A	Ba	C	Bb	C

其中

$$k_0 = (\frac{3}{8})^{0.5}, \quad k_1 = \frac{1}{4} \cdot \frac{M_1}{M_2}, \quad k_2 = \frac{3}{2} \cdot \frac{M_2}{M_1}.$$

进一步的, 如果我们用 $r = r_1r_2 = (\alpha_{1x}/\alpha_{2x})(\alpha_{1y}/\alpha_{2y})$ 来衡量外生比较优势的大小, 则有: $\partial k_0/\partial r_1, \partial k_0/\partial r_2, \partial k_1/\partial r_2, \partial k_2/\partial r_1 < 0$, 这意味着给定 k 值, 比较优势越大, 均衡的分工结构就会越高。通过上述计算结果, 可以得到下面的重要结论, 即一般均衡结构由两个地区的相对生产力和交易效率水平决定, 给定生产力水平, 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使一般均衡结构从自给自足跳到局部分工, 然后跳到完全分工状态; 给定交易效率, 则比较优势越大, 均衡分工水平就会越高。

可见, 一个由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构成的经济体系发展的一般机制是: 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构成了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相互贸易的驱动力, 比较优势越大, 驱动力就越强, 但这种力量会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 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促进分工和贸易的发展, 相反, 即使比较优势很大, 但地区间的交易费用很高, 地区之间仍然不可能利用比较优势形成统一的大市场。我国已有的发展经历充分验证了上述结论。当存在地方贸易保护从而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分工经济的好处, 地方贸易保护提高了地区间的交易费用, 导致了分工演进过程的停滞甚至逆向发展。那么, 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内生出地方贸易保护行为呢?

四、地区发展与地方保护

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地方贸易保护之所以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源在于市场化条件下地方利益主体的自利行为。事实上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 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远不及前苏联那么高度集中, 国家曾多次向地方分权让利, 最突出的两次集中在 5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 这两次向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权被看作是对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的重大冲击。因此, 当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时候, 相对于前苏联的计划体制, 中国经济更靠近市场化的边缘, 具有“准市场”的性质, 这实际上成为中国改革选择渐进式道路而不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原因 (Sachs & Yang, 2001)。始于 1978 年的新一轮改革仍然是将放权让利作为突破口, 即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 实施财政包干制, 下放投融资权限和下放企业管理权限。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 相对其他国家, 中国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很大的。张维迎和栗树和 (1998) 的研究表明, 80 年代初的地方分权政策导致了地区间竞争, 从而引发了民营化, 促进了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民营化的主要力量。相反, 如果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国有企业则民营化就不会发生。钱颖一等人的研究也验证了类似观点, 并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可见, 始于 50 年代的以放权让利方式增强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改革是推动我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重要力量, 以放权让利来带动地方竞争和产权改革也是我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但是, 地方政府利益的增强也为市场化过程中的地方贸易保护埋下了伏笔。

由表 1 容易看到, 在结构 Ba 中, 当地区 1 与地区 2 进行自由贸易时, 地区 1 的经济单元并不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因为其效用水平与自给自足时相同 (都为 $1/2$), 而地区 2 则得到了全部的贸易好处。可见, 地区 1 具有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以争取更多贸易好处的动力。在现实经济中, 地方贸易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 如在产品或生产要素的流入和流出中采取完全禁止或数量限制、实施技术壁垒或费率控制等, 但这些措施的实质都可概括为增加外来

商品的销售成本,从而制造进入壁垒,⁷因此我们可以将地方贸易保护抽象为强加在购买外来商品上的一种费用。假设每一种商品增加的费率为 t_i ,而地区 i 的政府把从购买外来商品加收 t_i 费率所获得的收入平均分配给当地的每一个经济单元(收益为 R_i),从而使每一经济单元的预算约束发生变化,例如在某地区完全分工生产 x 的状态中,预算约束就会从 $p_x x^s = p_y y^d$ 变为 $p_x x^s + R_i = (1 + t_i)p_y y^d$ 。这样,在变化后的预算约束基础上重新按照以前的步骤进行超边际分析。地方保护行为的加入使计算的结果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当 $t_1 = t_2 = 0$ 时,生产两种产品的地区的真实收入在自给自足和与专业化生产地区的贸易中是相等的,即半分工地区不可能从与完全分工地区的贸易中得到任何好处;在结构Ba中,有 $\partial u_1 / \partial t_1 > 0$,即给定地区2费率的基础上,处于半专业化状态的地区可以通过提高地方保护力度来改善自己的福利水平。这是因为半专业化地区可以通过地方保护改变与专业化地区的贸易条件,从而获得更多的贸易好处。相反,完全专业化的地区则不能通过地方保护改善贸易条件,因为 $\partial u_2 / \partial t_2 < 0$,即通过地方保护,发达地区只能使其自身的福利受损。

可以看出,当两个地区间的政府展开一场关于是否进行地方保护的博弈时,在贸易双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它们会选择各自不同的贸易政策。结构Ba描述的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结构中,纳什均衡表现为发达地区选择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而欠发达地区则会选择地区保护政策。可见,欠发达地区贸易中的地方保护行为之所以广泛存在,而中央政府在消除地方保护的 policy 之所以实行起来有很大难度,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需要达到的结果并不符合现实中的纳什均衡。

在结构C中,两个地区则都可以影响贸易条件。但是,由于 $\partial u_1 / \partial t_1 > 0$, $\partial u_2 / \partial t_2 > 0$,因此每个地区在贸易关系形成的初期都会有动力去尽可能地提高保护力度来争取更多的贸易好处。但是,如果他们都这样做,在长期贸易关系中两者都会最终受损,因为 $\partial u_1 / \partial t_2 < 0$, $\partial u_2 / \partial t_1 < 0$ 。

从纳什议价博弈(Nash bargaining game)的角度看,也能得到同样结论。在两地区政府的纳什议价博弈中,每个地方政府从理性角度出发将从分工中得到的净收益的纳什积(Nash product)最大化。在结构C中,有:

$$V = V_1 V_2 = [U_1(C) - U_1(A)][U_2(C) - U_2(A)].$$

从两个一阶条件 $\partial v / \partial t_1 = \partial v / \partial t_2 = 0$,可以得到 $(1 + t_1)(1 + t_2) = 1$,因此纳什议价博弈的解为: $t_1^* = t_2^* = 0$,这意味着发达地区之间的贸易会选择取消地方保护、推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当然,由于 $\partial u_1 / \partial t_1 > 0$, $\partial u_2 / \partial t_2 > 0$,发达地区间的贸易也不能排除某些时候当地政府会通过地方保护的方式来争夺分工经济带来的好处。但总的来讲,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发达地区间的贸易更倾向于通过自由开放的方式来实现。

⁷ 对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出进行限制也可以保护经济。这种保护方式的对象一般是资源类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如烟草、蚕茧等。通过保护可以使当地的生产商获得价格低、质量好的原料,而外地生产商只能得到质量较低的产品或必须通过更高的价格来购买同样质量的产品,这样可以提高当地生产商的竞争力,增加外地产成品进入本地市场的难度,实质上是间接增加外来商品的进入成本。

五、对模型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计算简便, 在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假设只有两种产品存在, 而相对发达地区只专业化生产其中的一种产品。但在现实经济中任何一个地区特别是较大的地区都不可能只生产一种产品, 而可能是借助产业体系供给一系列产品。一般来讲, 相对发达地区各个生产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会普遍较高, 但并不排除这一地区部分行业处于较低的专业化分工状态, 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 发达地区也往往会对自身的劣势产业给予保护和扶持, 特别是这一产品涉及到地方政府更多经济利益时就更会受到关注。例如贵州省虽然总体经济状况落后, 但烟草业却比较发达, 而烟草是高利润行业, 外地政府会采取措施限制贵州卷烟进入。贵州省每年卷烟产量的三分之二都要销往省外, 各省的限制政策使其烟草产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⁸。可见, 地方贸易保护行为更普遍地存在于相对发达的行业与欠发达的行业之间, 而不完全限于发达与不发达的地区之间⁹。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各个地区都基本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结构面临大幅调整的过程中, 各地政府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和减缓就业压力的目的都可能对本地区的弱势产业给予保护, 从而使地方贸易保护和市场分割现象在各个地区普遍存在, 这一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然, 这并不影响文中模型所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 分工结构受到相对价格的影响。例如在结构 Ba 中, 当 $p > \frac{1}{2k}$ 时, 人们会在生产 x 商品上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 同时减少 y 产品的生产。可见, 合理的比价体系是一个经济社会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中国长期以来的价格体系不合理, 则是造成地方贸易保护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周伟林, 1997)。在价格不是由市场自发形成, 而是由国家统一定价的体制下, 商品价格可能被人为地抬高或压低。特别是我国为推动工业化发展, 曾长期压低农产品、矿产品及其它原材料产品的价格, 抬高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 导致各地争相发展加工工业, 这一方面使农业、能源、交通和原材料工业投资不足, 另一方面又导致对原材料的更大需求。出于对本地利益的保护, 地方政府纷纷实行市场封锁。80年代后期, 封关设卡, 争夺资源的诸如“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等现象遍及全国。由于价格体系不合理而导致的贸易保护是我国地方(行业)贸易保护的一个突出特点。

关于本文模型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 在上面的模型中政府所做的决策是从短期利益出发的, 模型中不同地区之间贸易的收益分配也只是短期或者说静态的结果。如果从长期的角度运用考虑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回馈链条(feedback loops)的动态方法考察上述问题, 模型的结果就会发生有趣的变化。例如在 Ba 中, 其贸易条件(即相对价格 p_x/p_y)为 $1/2k$, 随

⁸ 据国家计委的调查, 1999年贵州卷烟生产计划为202万箱, 按常规应有135万箱调往省外, 但实际仅调出111万箱, 导致全年仅生产卷烟187万箱, 少生产15万箱。

⁹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亦是如此, 日本2001年上半年开始对从我国进口的蔬菜等农产品实施限制并对超出部分征收高额关税就是典型的例子。

着交易效率 k 的不断提高, 贸易条件开始变坏。但当交易效率 k 增大到 k_1 之后时, 均衡结构将从 Ba 跳跃至 C , 真实收入水平将得到提高。因此在欠发达(半分工)地区, 只要其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不断提高, 即使这一地区与其它地区交易中的贸易条件变坏, 它仍然可能得到较多的贸易好处, 这是因为分工网络的扩张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得到的好处超过贸易条件变坏的负面影响。张定胜(1999)运用一个更复杂的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李嘉图模型同样证明了上述结论, 森(Sen, 1998)提供的经验证据也表明经济发展与贸易条件变坏可能同时发生。因此, 只要交易效率改进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超过了贸易条件变坏的程度, 不发达地区采取自由贸易而不是贸易保护政策在长期中也可以从贸易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张永生(2000)的新兴古典模型还表明, 通过投入产出的联系以及分工的网络, 专业化经济的好处可以在网络中传递转移。¹⁰ 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也可以通过融入更大和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分工网络享受到分工经济的好处。

六、结论: 地方贸易保护与政府角色定位

将地方政府行为引入外生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地区间贸易模型及其拓展告诉我们, 落后地区在与发达地区的贸易往来中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贸易政策: 一是通过贸易保护来改善贸易条件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贸易好处; 二是实施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 通过改进交易效率来扩大贸易网络。张定胜(1999)用“分馅饼”做比喻来说明这两种贸易政策的不同效果, 前者类似于落后地区从一个缩小的馅饼中争取较大的份额, 因为贸易保护会带来效率损失; 后者则是落后地区从一个扩大的馅饼中争取更大的份额。模型表明, 从短期利益出发, 贸易保护将是落后地区(行业)同发达地区(行业)之间博弈的结果, 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 是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只要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间进行贸易, 这一现象就可能发生并长期存在。但是从整体经济的发展来看, 地方保护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 它极大阻碍了市场化进程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使分工经济的好处无法被充分利用。¹¹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 落后地区选择自由贸易、取消地方保护行为, 并努力通过提高交易效率而扩张分工网络是最优选择。如果说放权让利在早期推动我国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促进地区间竞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话, 那么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 在市场化已发展到一定阶段, 并且加入 WTO 和面对日益汹涌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的情况下, 采取有力而适当的措施逐步消除地方贸易保护, 努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和建立统

¹⁰ 张永生(2000)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 即为为什么一些专业化经济很不显著的劳动比如在餐馆端盘子之类的简单工作, 在美国的收入就比中国高得多。他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更高水平的分工网络的存在, 使从事端盘子这样的工作的人也能分享到计算机软件设计等高专业化经济行业的好处。

¹¹ 地方保护不良后果的一个例证是,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全国性商业企业, 地方保护使这些企业只能在本地发展而很难向其它地区拓展。

一的大市场, 应该成为中央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¹² 我们认为, 中央政府这一目标的实现, 应当围绕引导地方政府特别是落后地区政府决策从短期向长期转变这一中心, 而采取相应的措施。然而, 当存在地区(行业)间的经济差异时, 强制取消落后地区的保护政策, 将使其短期内无法从贸易中获利, 缺乏从事贸易活动的激励。而且落后地区被卷入统一市场的过程必将伴随以外部经济冲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熊彼特, 1934), 短期内可能会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福利损失。政府官员的任期制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考评制度进一步加重了决策行为的短期化, 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这种“毁灭”过程出现在自己的任期内, 而将“创造”性的长期成果留给别人。因此, 以财政包干、大量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地方所有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性分权是导致地方贸易保护现象出现的深层体制原因, 而传统体制遗留的工业布局、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地方领导的业绩评价等因素也强化了地方市场的分割倾向(国家计委课题组, 2000)。所以, 消除地方贸易保护的努力必然由长期中的一系列工作环节构成, 而不可能是短期中的单兵突破。我们认为, 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

一是应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 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¹³ 充分发挥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职能, 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制度, 通过转移支付给予欠发达地区一定的补偿, 并制定相应的激励相容的政策来减少地方保护行为。

二是应当大力关注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给予落后地区一定的倾斜政策, 不断提高落后地区的市场交易效率, 同时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积极推动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

三是通过立法手段强制地方政府取消贸易保护政策, 但采取这种方式必须给落后地区一个恰当的缓冲期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四是应当引导地方政府转变职能,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张维迎, 2001), 建立更加科学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政绩考评体系。随着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建立, 评价地方官员的标准不应只是当地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 更重要的应当是看当地经济环境的建设状况。政府最主要的任务应当是通过完善法治, 界定和保护产权, 提高通讯、交通效率, 改善生态环境等手段, 为经济发展和组织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如果继续强调以财政收入作为地方政府的中心职能和追求目标, 那么地方贸易保护就很难减弱和消除。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当大力提高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交易效率, 交易效率的改进将加快落后地区分工演进的进程, 加快其进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步伐。

¹² 1994年,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明确指出, 要“规范市场行为, 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 要“进一步开放市场, 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部门, 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进一步放开价格,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中的基础性作用”。

¹³ 90年代中后期国家虽试图通过建立新税制来校正和改革行政性分权的弊端, 但这次改革并没有消除地方保护的财税基础, 突出表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没有脱离隶属关系, 没有触动大量国有企业实际上的地方所有制(银温泉和才婉茹, 2001)。

参考文献

- [1] Cheng, W., Sachs, J. and Yang, X., "A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f the Ricardian Mode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0, 8, 208-220.
- [2] 国家计委研究院课题组, 《在市场体系建设中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2000年。
- [3] 罗伯特·J. 巴罗等, 《经济增长》(中译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 [4] Sachs, J. and Yang, X.,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framarginal Versus Marginal Analyses*, Blackwell, 2001.
- [5] Yang, X., *Economics: New classical Versus Neoclassical framework*, Blackwell, 2001.
- [6] Yang, X., and Borland, J., "A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60-482.
- [7] Young, Ally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28, 38, 527-542.
- [8] 银温泉和才婉茹, "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对策", 《经济研究》, 2001年第6期, 第3-12页。
- [9] 杨小凯, 《经济学原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 [10] 杨小凯, 《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 [11] 杨小凯、张永生,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
- [12] 杨小凯、张永生, "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导论", 《经济研究》, 1999年第7期, 第67-77页。
- [13] 杨小凯、张永生, "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 文献综述", 《经济学季刊》, 2001年第1卷第1期, 第19-44页。
- [14] 张定胜, 《经济发展, 贸易模式和收入分配》,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9年。
- [15] 詹姆斯·A·道编著, 《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译本),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 [16] 周伟林, 《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年。
- [17] 张维迎、栗树和, "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经济研究》, 1998年第12期, 第13-22页。
- [18] 张永生, 《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的不相关性: 理论与实证》,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0年。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gional Trade Protectionism

XIAOLONG WANG BIN LI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The paper giv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or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Specifically, after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ocal division of labor, we try to model the protective behavior of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in terms of inframarginal analysis approach in the framework of Ricardian model with transaction costs, and then extend our model to other relevant phenomena.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offer proper incentives to make sur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make policies in long run instead of in short run.

JEL Classification H77, O29, R58